

日本研究的课题与方法” 学术座谈会纪要

张义素

1996年12月26日,《日本学刊》编辑部主持召开了“日本研究的课题与方法”学术座谈会。在京从事日本研究的部分专家学者及编辑人员,共约40人出席了座谈会。

改革开放至今近20年来,中国的日本问题研究取得了飞跃发展,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与日俱增。特别是近几年来又有许多留学人员陆续学成回国,成为科研一线的骨干。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日本问题研究正酝酿着一次从量到质的飞跃。《日本学刊》副主编韩铁英在就中国的日本研究现状发表了上述看法后呼吁学界同仁抓住这一时机,携起手来共同努力,使这个飞跃变成现实。

同时,他指出,我国的日本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应冷静地看到,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如资料匮乏、人材外流、资金短缺等。特别是研究工作中也还存在着低水平重复现象,以及课题的选择不能适应国家现实需要和研究方法不够先进、科学等问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使日本问题研究上一个新台阶,首先必须从课题选择和研究方法入手,加强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从研究队伍的结构来看,有许多具有多年研究经验的行家里手,也有不少近些年涌现的新秀,他们在知识结构上和研究方法上各有千秋,但相互间交流的机会很少。就编辑部工作而言,也有如何选题、组稿以及如何从研究方法上判断稿件的质量等问题。就日本研究的课题和研究方法论作一些探讨和理性的分析,是我们把日本研究推向新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

接着,与会人员围绕会议主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前所长何方强调说,中国的日本研究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要提高研究成果的理论性和学术性。日本研究要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现实服务,要搞有中国特色的日本研究。日本研究所副所长蒋立峰也强调指导思想很重要。不论研究工作也好,编杂志也好,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

就目前日本研究中对日本本身的变化与外部关系的研究比较薄弱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张蕴岭指出,日本正处于政治、经济、社会的转变时期,这个时期很重要的特点是这种转变不仅受到了国内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了国际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应加强对日本本身的变化与外部关系的研究。另一方面,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工作与其他单位的研究不同,我们的研究应着眼于综合性、长期性的分析。

北京大学教授严绍 瑛指出,90年代与70年代相比,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正在发生大的变化,他们对自身成长道路上发生的许多事件的观察和认识,包括对中国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人。第一是曾经参加过反美斗争和民族民主斗争的一部分人,他们开始对自己以前的作法产生怀疑和反省。第二是专业知识分子,他们的精神状态也在发生变化,许多事实充分说明了在日本知识分子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我们必须引起注意。在研究方法上,他认为应提倡实证的研究方法,并提出了几点实证研究的基本操作原则:(1 提供的材料要有原点性,原点材料应是与事件的发生相近的材料,因为原点的材料并不都可以作证;(2 原点材料必须有确证性;(3 实证材料有文献和实物两种,文献实证要有文化氛围的精神。实证的观点和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使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个别文化与世界互相联系的桥梁。因此,实证的观点和方法也包含着最终上升到理论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高增杰说,随着国际形势和各国国内形势的变化,日本研究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变化。第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开始,日本研究正在从分科化研究向综合性研究转化,综合国力的研究越来越得到各国研究者的认同;第二,在地区研究方面,过去美国学者曾提出过一个模糊的概念:(1 地区研究是对对象国的全面的、科学的研究;(2 根据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文化的相对性和历史性进行研究;(3 地区性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据比较的方法进行研

究。这三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得到各国学者的认同。但是,从 60 年代初开始,地区性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强调学科分得细,而是强调综合地、立体地、全面地把握对象国。根据地区研究学科的发展,在进行日本研究时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1) 在研究日本时,必须综合地把握对象国,为此,就要扩大我们的视野,把日本放在东亚、亚洲甚至世界的整个文明中来看待;(2) 只有进行比较研究,才能把研究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如近代化问题,把日本上一世纪发生的事情与英国、法国 16、17 世纪发生的事情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它们在发展道路上、社会结构上、民族精神上的相同之处和差异,这样才能很好地把握对象。反过来说,不要把藩篱划得特别细,防止学科边缘化,各个学科应很好进行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汤重南说,实证研究很重要,因为原点错了,所有的结论都站不住脚。但是,作为研究方法,决不能仅限于此,一定要有理论思维,一定要有很好的方法论,微观的研究一定要与宏观的考察结合起来。如果每个研究人员都一个一个地陷入到实证研究中去,理论水平就得不到提高。因为我们只搞清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做什么还不行,还必须搞清为什么,有何现实意义,有何价值的问题。我们的研究要随着时代的脉搏跳动,不断地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才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服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东亚研究室主任刘江永说,日本研究就像一条宽阔的长河,是不断流动的,永远研究不完。他指出,当前日本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综合性、战略性的成果太少。应加强对处于跨世纪时代的日本国际战略地位、发展方向、战略走向等宏观课题的研究。他列举了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如在政治方面有政权分析、政治思潮、政治势力、革新势力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核心人物的历史背景和主要观点、日本面向 21 世纪的行政改革、宗教与政治、金钱与政治、财界与政界的关系等、经济方面有日本的经济形势、金融、投资、贸易等各个领域的新的变化与相互关系、日本经济与亚太经济的关系、多边经济合作、日本与世界经济关系、中日经济关系等;对外关系方面有中日关系研究、日美关系研究等;文化研究方面有人物研究、整体群象研究、思潮研究等。

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副教授江瑞平说,在分析与综合两种研究方法上应强调一下综合,在实证和理论研究方面应强调理论研究。这四种研究

方法对于研究人员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实证研究只是研究的初级阶段,但仅限于此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学术探讨和理论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方法问题不是孤立的,是与课题联系在一起,而且研究方法是与课题密切相关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由研究对象决定的。他认为,日本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日本社会矛盾及其运动规律,研究的目的是在这些矛盾中总结出规律,然后上升为理论。

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骆为龙谈到了近年来我国日本研究的几点引人注目的情况:(1)全国特别是一些地方的日本研究发展很快,成果较多。(2)在日本研究队伍中年轻一代学者迅速增加,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问题是目前国内外学术交流不够,应予加强。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赵阶琦也说,中国对日本的研究确实有发展,但也存在着问题。我们对日本政治的研究力量较弱。现在日本仍处于过渡期,对其今后将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我们研究得很不够。今后应把研究日本的动向作为重点,提出综合性的、战略性的看法,客观地评价日本。

《日本学刊》编辑部前副主编马桐山说,我们应注重对日本当政领导人更迭的研究。当政领导人包括政府领导人、政党领导人及其重要智囊团的负责人。因为这些人的更迭对日本的政策走向和中日关系起着重要作用。日本现在的领导人大都是昭和年代出生的,应弄清他们的历史观、经历和其制定政策的动力是什么。其次是国民思潮问题。这也是很重要的问题。从深层次上讲,中日两国国民的思潮涉及到日本人的中国观和中国人的日本观问题。国民思潮对政党、政府的政策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关于研究方法问题,他认为,我们既不要忽视宏观研究,也不要忽视微观研究。微观研究、个案研究搞得不好、不深入,宏观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缺乏基础的。

会上,还有许多同志对办好《日本学刊》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主要有:(1)内容要新,要多样化,要有可读性;(2)版面要办得活泼,要能吸引人;(3)刊登一些争鸣性的文章;(4)为扩大影响,可向国内外其他报刊推荐一些好的文章。

(责任编辑:洪鸿)